甲午殇思

刘声东 张铁柱 主编

勿忘国耻
勿忘军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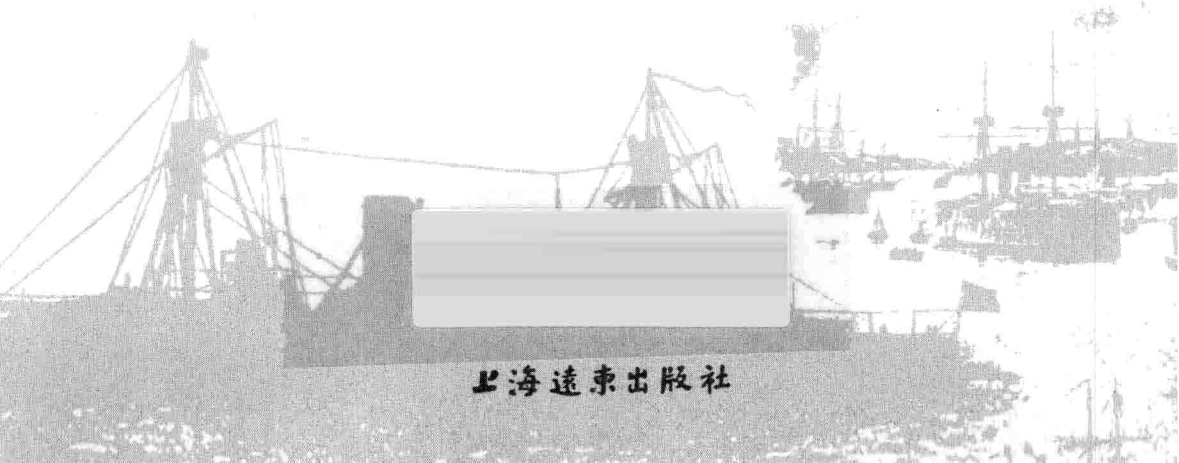
刘亚洲 丁一平 皮明勇 肖天亮
余爱水 金一南 罗 援 肖裕声
彭光谦 徐 焰 张 炜 姜春良
孟祥青等撰文

上海遠東出版社

甲午海战回忆

刘亚洲等 撰文

刘声东 张铁柱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午殇思 / 刘声东,张铁柱主编；刘亚洲等撰.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ISBN 978-7-5476-0853-1

Ⅰ. ①甲… Ⅱ. ①刘… ②张… ③刘…
Ⅲ. 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Ⅳ. ①K25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3051号

甲午殇思

撰　　文/刘亚洲等
主　　编/刘声东 张铁柱
责任编辑/徐忠良 杨秋成
装帧设计/熙元创享文化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邮编：200235
公众微信:yuandongchubanshe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32　插页：2　字数：396 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6-0853-1 /G.612
定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1-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印刷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 转 8538

策划心语：我们无权不殇思

2014，又逢甲午。

120年前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宛若无法痊愈的伤口、无法挥去的噩梦、无法逾越的鸿沟，令人在无法驱散的硝烟中悲不自胜。

当年的北洋水师主舰“定远”舰被打捞起来后，迄今仍在日本福冈的街头，被拆造成“定远馆”风餐露宿；甲板改造成的大门上弹痕累累，一个多世纪以来默默述说着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屈辱；邓世昌、丁汝昌、刘步蟾……这一个个宁死不屈、舰亡人亡的军魂，在异国他乡的“定远”上泣血！

当年的侵略者日本，右翼势力恶性未改，依旧气焰嚣张；从倾坍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有一些人麻木习气尚余，散沙根性犹存。愿泱泱中华的国魂、军魂，从对甲午战争的殇思中汲取力量，更加强壮！让我们记起盛唐的痛击，曾打得日寇一千年俯首称臣；大明的骁勇，曾让日倭二百年不敢来犯。

为了少流生命之血，少抛民族之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组织刘亚洲、丁一平、皮明勇、肖天亮、余爱水、金一南、罗援、肖裕声、彭光谦、徐焰、张炜、孟祥青等军事名家，以中国军人的家国情怀、当代学者的文化良知，就120年前的甲午战争的惨痛历史教训，进行深刻、全方位的反思，走进历史深处，回应现实关切，倾听未来呼唤，撰成长篇研究论述和血泪文章，以期警醒国人和全军

官兵勿忘国耻，勿忘军耻，知古鉴今，重振国威。

这组长篇反思深思文章，字字千钧，句句泣血。自 2014 年 3 月 3 日至 4 月 11 日在《参考消息》连载以来，激起了军内外各界读者的热烈响应。应广大读者要求，我们特将其充实完善，汇编成册，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公开出版。

相信这组极有含量的政论性文章，既能激起我们勿忘国耻、矢志强国的奔腾热血，也能引发我们理性判断、对症下药的冷静思考；既能帮助我们梳理历史思绪，也能激发我们增强时代担当。

“虽有其心，难有其力”，是尴尬。

“虽有其力，难有其心”，是悲哀。

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华儿女，反思反省，应有其心；抗耻拒辱，当有其力。

马年春节，有这样一条特别提神提气的拜年短信：

甲午重触中国痛，天马扬我汉唐风。

谁敢兴风作恶浪，叫他赎罪到祖宗。

一位将军和诗一首，表达心志：

回首甲午心惟痛，放眼新春梦汉风。

何惧鬼魅再作孽，策马待命箭在弓。

这样的诗句读来让人热血沸腾。

岁逢甲午，狼烟犹在。我们无权不殇思！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　刘声东

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　张铁柱

2014 年 4 月 18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代序：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由甲午战争谈起

刘亚洲

刘亚洲

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军衔。毕业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参军后历任排长、副连长、军委办公厅干事、师级单位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等职。

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组织策划的“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自2014年3月3日起在《参考消息》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文章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文中简称记者）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

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

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

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后来，“战争 + 国民 + 国民国家形成”这种形式，构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甲午战争 10 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两份广为流传的名单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如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刘子壮、陈沆……然而大家对他们知之甚少。第二份名单上的人有吴敬梓、蒲松龄、洪昇、袁世凯等，这些人赫赫有名，却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最能说明清朝的教育出了大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5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后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王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二、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

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国家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伐朝鲜；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清朝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是中国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其他地方。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既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1856年，英、法等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〇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实际上成为了日后更有世界影响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催生婆。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的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博”。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

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均毕业自英国的海军院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 20 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军事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

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而中国则自此万劫不复。仅举海军为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三、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

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以及在场中国人的麻木表情。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道："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

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蒙、满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 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

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受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那么伤亡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